

# 1957年《文艺报》的改版

钟 媛

**内容提要：**《文艺报》1957年的改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学界对此研究得并不充分。本文主要通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还原1957年《文艺报》改版酝酿、发生的历史背景，改版的具体措施和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讨论空间等相关因素。

**关键词：**1957年 《文艺报》 改版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7.11.011

1957年的《文艺报》改版是百花时期文学期刊改革潮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次改版是在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背景下发生的。

1956年，国家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中央在对新的政治形势做出评估后，开始转变方针战略。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认为经历过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期刊改革的潮流既是策动知识分子重新登上舞台的一种工具，也是呈现知识分子话语的一种方式。“双百”期刊改革，一方面体现在创办的众多新的文学刊物上，如《诗刊》《延河》《新港》《萌芽》《星星》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已有文学期刊办刊理念的改革上。<sup>①</sup>在此时期，有绝大部分刊物通过改名的方式来表达向文学本体及专业回归的想法，如改名为《新苗》的《湖南文艺》，改名为《雨花》的《江苏文艺》，改名为《草地》的《四川文艺》等，还有更大胆的一部分是回归“文人办报”“知识分子办报”传统，比如以江苏的《探求者》为代表的同人期刊探索。

1957年《文艺报》的改版也是这次改刊、创刊风潮中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文艺报》在宣传政治方针和文艺政策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报》创办以来所发生的两次改版活动却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一次发

生在1956—1957年“双百”方针实施期间，另一次发生在1981年。两次改版正好都发生于历史转折点上，具体而言，1957年的改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较为大胆的革新，在突破苏式“一体化”模式的限制，探索自身文化建设思路方面显得尤为可贵。另外，在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实践层面，1957年的改版为1981年的那次改版提供了经验。

然而《文艺报》改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改版所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文坛生态在“反右”开始后迅速转向战斗姿态。《文艺报》1957年7月开始，第14期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开篇，到1958年第1期的《致读者》发表，彻底将这次改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摧毁了。在这篇《致读者》中，编辑部写道：“当你们拿到1958年第一期文艺报的时候，首先引起你们注意的，是我们的期刊和版式有了改变。也可能有读者这样说：文艺报换上了一件朴实的衣裳，作风也显得比过去扎实一些了……到底开始表现了我们整改的决心。”<sup>②</sup>

## 二

《文艺报》改版的酝酿和发生过程，学界的研究仍然不充分，因此通过史料的整理和爬梳，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理十分必要。

首先，《文艺报》改版的发生与《人民日报》改版有着直接联系，《人民日报》改版中所形成的相对自由、民主的气氛和专业办刊方针对《文艺报》的改版趋向有着积极影响。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思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改革都是“双百”方针实施的重要步骤。据胡乔木回忆，1956年年初，他向毛泽东请示有关《人民日报》改版的事宜，“毛主席在1956年鉴于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很希望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提出双百方针是个重要标志。《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开始由原来的一张扩大为两张，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动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毛主席对宣传方面的新想法还有好多。”<sup>③</sup>正是在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日正式改版。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由4版增加为8版，从版面容量来说扩充了一倍，同时回归报纸的宣传和报道规律，尊重消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注重读者需求，增添自由讨论的空间，在7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致读者》一文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都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

的主人。”<sup>④</sup>这是《人民日报》办刊宗旨上的进一步升华，也对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新闻出版方式有着重要意义。面对《人民日报》的成功改版，《文艺报》迅速做出了反应。据黎之回忆：“《文艺报》1957年在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同作协领导人共同策划下由杂志改为对开大报。这是在1956年《人民日报》由胡乔木主持七月改版影响下进行的。当时胡乔木代《人民日报》写了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扩大报道范围，展开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项要求。《文艺报》也根据这些要求办。”<sup>⑤</sup>因此，正是在《人民日报》的这种改革指导方针下，《文艺报》依照《人民日报》改版的指导思想筹划了改版。1956年第14期，《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人民日报”改版的题外文章》，这篇文章是舒芜应《文艺报》编辑之约谈有关《人民日报》改版后的成功之处和阅读体验的，尤其是改版后的第八版对于全国文艺性报刊的影响。舒芜认为：“我觉得‘人民日报’这次改版，成功的原因并不在改版本身。报社编辑部花了很大力气，找到一些作者，他们过去写作成就虽有悬殊，但各自有其特色，只是解放后这几年才变得互相类似起来，现在就要求他们抛开这种互相类似，恢复过去的特色，而报纸则以发表他们恢复了特色的作品与他们建立关系，第八版使人视听一新，奥妙无非如此。”<sup>⑥</sup>在舒芜看来，《人民日报》文艺版改版的成功关键在于“个性”与“特色”的复燃，而舒芜的这种观点在后来《文艺报》的改版过程中成为其体现“知识分子”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报》的改版，并非从《人民日报》改版以后才着手，在开始筹备的时间和计划上两者几乎是同时的，一般文学史的描述中却往往都将《文艺报》的改版筹备视作1956年年底才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譬如，洪子诚在《1956：百花时代》中，认为“在1956年岁末，周扬等开始积极筹备《文艺报》的改版，指定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负责筹备工作”<sup>⑦</sup>。古远清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史》中认为：“1956年岁末，周扬开始《文艺报》的改版工作，企图把该报办成苏联《文学报》那样‘权威性的报刊’。”<sup>⑧</sup>等等。1956年年初，中央指示胡乔木和邓拓正式启动《人民日报》的改版事宜，同时《文艺报》也开始准备与《人民日报》实行同一体系的改版工作。但从参与策划人郭小川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出，在具体筹划时间上，《文艺报》的改版问题从1955年年底便开始了，只不过正式改版和改革活动密集呈现于1956年并最终实现于1957年。1955年12月《郭小川日记》中记载，“4日……考虑了一下《文艺报》改版问题，即去笑雨处，谈《文艺报》和羊耳关于个人崇拜的文章”。“5日九时去作协，讨论《文艺报》改版问题。”<sup>⑨</sup>从中可以看出，《文艺报》改版问题从1955年年底便开始酝酿、筹划。此外，从张光年的记述中可以佐证郭小川作为当事人之一，其日记记载的可靠性。张光年曾回忆，“周扬

指定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和我一起搞改版的筹备工作，表示他对改版的重视”<sup>⑩</sup>。此外，从《文艺报》本身透露出的变化痕迹也显示出其改变从1956年年初就透露出新信号。1956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开篇的《作家们掀起一个新的创作高潮》配合《万象更新图》形成的“万象更新图”解说诗（袁鹰、马铁丁、袁水拍所作）透露出1956年开篇的一种新气象。第2期开始发布“中国作家协会将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预告。第3期，《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等文章，通过对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作《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解冻》等作品的介绍，开始倡导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直面现实和问题的创作理念。直至1956年第24期刊出《文艺报》改版的通知：《文艺报》将要在1957年4月改成周刊……《文艺报》作为一个文学艺术评论的刊物，在贯彻和促进这个方针的实现上，我们过去是做得很不够的。正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适应文艺工作新的形势的要求，刊物就需要除旧布新……逐渐消除教条主义的陈腐气息，要提倡以干预生活的热情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的精神，来建立健康的、朴素的文风。<sup>⑪</sup>这个过程正好暗合了郭小川在自己日记中提到的关于1955年年底开始的《文艺报》改版筹备工作——也就是说，《文艺报》的筹备改版从1955年年底开始提上日程，通过1956年的逐步策划与实施，最终实现于1957年4月。

其次，通过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和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文艺报》的改版做好了制度和理论层面的准备，对于“机关刊物”和等级关系取消等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文艺报》打破封锁，回归文艺报刊应有的特色。1956年2月27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发生于百花文学肇始之时，这次会议对《文艺报》的改版做出了如下决定：“一九五六年将现在的《文艺报》改办为具有群众性和政治性的文化艺术的报纸（三日刊）。”<sup>⑫</sup>从“文艺党报”性质的《文艺报》转变为具有“群众性”也即“公共性”的《文艺报》，此次会议对《文艺报》的根本属性和办报宗旨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而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对百花时期文学期刊改革的发生有着更为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探讨涉及期刊改革理念和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对《文艺报》改刊的发生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取缔“机关刊物”称号，打破了刊物等级分明的壁垒。会上经过讨论，认为“‘机关刊物’这个说法，到现在成了对刊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种束缚，大家都同意从明年1月起，各文学刊物一律取消这个‘头衔’，各刊物之间去掉那种不成文的指导或领导的关系，大家平等，展开相互间的批评和竞赛”<sup>⑬</sup>。取消“机关刊物”的头衔，与取缔“领导”关系，是期刊改革中触动核心层面的部分。这种改革是一种解构集权的做法，对于文艺

的自由空间开拓而言，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但是对于中央层面而言，这种做法注定了无疾而终的结局。至少从《文艺报》的顾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和尴尬。从郭小川对这次会议所作的会议笔记来看，当时的探讨，围绕期刊如何“放”和“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文艺报》在讨论中认为，小的刊物可以展开争鸣，而大的刊物，例如《文艺报》自身是不太适合深入展开争鸣的，在“放”的过程中，要顾虑“鸣了以后后果如何”，并且提出“刊物风格不等于作家风格，趣味相投的办刊物，是否与百家争鸣相抵触，又争鸣，又批判很困难，一批判，就有关团结知识分子”<sup>⑭</sup>，造成在团结知识分子工作上的困难。

总体而言，《文艺报》对于此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还是积极拥护、热烈响应的。郭小川在关于“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的会议记录中提到，《文艺报》在“百家争鸣后发生好的效果，编辑部活跃，大胆开放，并没问题，过去阻碍：1. 教条主义；2. 行政干涉；过去编辑部独立负责，批评中发生错误，用批评来纠正，而不做检讨，有问题经过讨论来解决。编辑部举行大的民主讨论”<sup>⑮</sup>。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通过理论上的不断改革与民主探讨，《文艺报》改版才有可能顺利进行。经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对于“教条主义”和行政对于文艺发展干涉造成的负面影响。

最后，为顺利完成改版，《文艺报》在编委人员调动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党外人士的加入和自由探讨的可能使得《文艺报》改版的探索和百花文学的建设相得益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报》编委人员就伴随着不同的政治运动而频繁变动。而1956—1957年这次《文艺报》编委人员的变动，却更多地呈现出包容性与开放姿态。

出于团结知识分子的目的，这次改版在人员调动上，尤其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吸收。1957年改版后，编委人员包括张光年、康濯、侯金镜、萧乾、陈笑雨、巴人、钟惦棐、黄药眠、陈涌等党内外人士。据萧乾回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他（指胡乔木，本文作者注）要我担任文艺部顾问时，……用意无非是让我们这些身无党籍、不通马列的半废品，多少也起些作用。”<sup>⑯</sup>另外，根据张光年在“文革”中交代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改刊时，对编辑人员设置上的特殊关照。“1957年文艺报改出周刊……周还让中宣部干部处为《文艺报》调集100人（包括文艺报编辑部原来的20余人，改版时达到80人）；又从中宣部抽调出陈笑雨来做副主任兼社会生活部主任，抽出钟惦棐担任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从《人民日报》抽调萧乾来做副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当时是要大干一番的……用筹备期间周扬的说法是：‘通过文艺批评这种社会方式实现中宣部对文艺的领导。’”<sup>⑰</sup>这虽是张光年在“文革”中交代的材料“我与周扬的关系”，但是对

于1957年《文艺报》改版时的事实描述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人员设置反映了在“双百”方针影响下，《文艺报》抛弃思想重负，重新敞开胸怀，吸收知识分子的包容姿态。

经过长时间的人员准备和试刊发行，1957年4月14日正式出版了改刊后的第1期《文艺报》，改版后的《文艺报》专业性大大增强，成为繁荣百花文学的重要阵地。改版后的《文艺报》，从形式上来说，8开本16页的设计使得信息量大大增加，及时报道最新的文艺动态和消息，色彩运用也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从原来的半月刊改为周刊，呈现出一番热情探索的姿态。此外，在版面构成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版是当时中央政策或最近最重要的文艺消息和新问题，结合美术作品呈现，二、三版一般是文艺消息、述评等，四、五版是当时盛行的小而精的文艺形式——特写、杂文、寓言、讽刺诗等，六到十三版即文艺理论问题、作家作品论等，十四、十五版是介绍外国文学和消息的版面，最后是广告版面。《文艺报》的这番改版，正是在上面所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经验上来进行的。版面设计的改造，语言风格的变化，封面、装帧、插图和色彩运用大胆的探索，都使得此次改版呈现出别样的生动。

### 三

1957年《文艺报》改版最主要的变化在其批判精神。1956年第3期开始，《文艺报》对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探讨，开始打破一直以来只描写正面、光明面的“歌德”文学传统，直面现实生活矛盾，回归文学真实。紧接着“干预生活”主题文学的讨论和批评进一步打开了言说的口径。从1956年第8期开始，又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典型问题”首先在苏联文坛上引起争论，苏联对“典型问题”的探讨旨在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而《文艺报》上对于“典型论”的讨论，则主要面对“公式化、概念化”“庸俗社会学”对于文学艺术性和文学个性的禁锢。无论是对“典型问题”“干预生活”“写矛盾”等口号和理论的探讨，还是之后对于“讽刺”手法是否可用的讨论，实际上，这都是批判精神的回归，保持对于当下的精神关照和真实性的追求。

随着“双百”的展开，这种批判精神在《文艺报》改版后得到了更加大胆呈现。批判精神的展开与报刊编辑理念的开放相互交融，扩大了百花精神的传播。1957年3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双百”方针以来的文艺成就，在期刊编辑和办刊理念上继续鼓励“鸣”与“放”，鼓励批评，允许反批评。1957年在北京又一次召开“北京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1957年4月28日出版的第4期《文艺报》对此进行了报道，针对当时对于“鸣”“放”的讨论，其中编辑部的疑问如“两条战线，哪条为主”，茅盾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恐怕要以反

教条主义为主。对于杂文的意见，认为也应当做一枝花，并且赞成“大开门”而非“半开门”。周扬则认为，我们目前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即思想落后于形式。他说，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大放还是小放”，周扬说，当然是大放。对人民只能讲民主，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我们应当着重积极方面的宣传，而不是消极地禁止。<sup>⑮</sup>

在这种情形下，《文艺报》在这个阶段发表了姚雪垠的《要广开言路》《打开天窗说亮话》、王若望的《板斧压不住阵脚》、程千帆的《从同志谈到红色专家》、黄药眠的《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张友松的《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对人民出版社及其上级领导的批评》等尖锐大胆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直指文艺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对于讨论空间的开拓是《文艺报》改版过程中体现的另一重要倾向。事实上，讨论空间的开拓最重要的影响就体现在对知识分子心态的“解冻”作用以及形成真正的学术争鸣过程中。以朱光潜为例，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虽保证其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正常，但其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却是屡遭批判的重要对象，然而1956年这次有目的的“自我批判”，却在当代美学问题中形成了一次完整的立足于学术上的美学批判。<sup>⑯</sup>1956年6月30日，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进行自我批判。从另一篇朱光潜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中，可以解读出他这一举动的心态。朱光潜说：“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号召之下，《文艺报》发动了对于我的美学思想的批判和讨论。整个的气氛就和从前大不相同了。首先我有机会和批评我的人见面，我对他们的批评也提意见，这样就解除了过去那种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的紧张形势，彼此虚心静气地说理。这就为针对问题认真讨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sup>⑰</sup>据朱光潜自己回忆：“在美学讨论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已分别向我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sup>⑱</sup>不过，《文艺报》出于充分开展自由讨论的意旨，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姿态，“我们认为，只有充分地、自由地、认真地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建设起来”<sup>⑲</sup>。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学术问题“自由空间”开拓的作用。从1956年6月《文艺报》发表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之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随即在《文艺报》《人民日报》《新观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这场批评与反批评的讨论，最终形成了我国美学史上著名的三次美学大讨论之一，并且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四大流派。

此外，从《文艺报》改版筹划开始，《文艺报》编委开始对五四以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刊物和编辑人员进行回顾与约稿，回眸五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这代编辑人员内心深处对于文学传统的真正认识——他们所反思现实的参照，正是一直以来不断被改造和批判的五四传统。《文艺报》从1956年第15期开始设立“旧事重提”这一栏目，通过约稿五四以来的名编辑、作家来谈五四以来的办刊经验。第15期特请徐调孚回忆了有关“小说月报”创刊改版和发展的情况：“‘文艺报’编辑部同志要我回忆一下过去编辑‘小说月报’等刊物的情况，想要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一边更好地掌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sup>②③</sup>徐调孚通过回忆《小说月报》的办刊特征，例如设立分栏，实行长篇小说连载、设置专号与特辑等编辑方式来实现更完善的编辑方式，另外通过对于阅稿、组稿经验和封面设计等的介绍，细致地展现了文学报刊的办刊方式。而第16期川岛的《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介绍了《语丝》的创刊过程及鲁迅与《语丝》的关系，通过《语丝》这个具有同人色彩的文学刊物的创办、分流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对于现有刊物办刊的理解。<sup>④</sup>由此可见，《文艺报》通过对于五四文学期刊办刊模式和经验的借鉴，来进一步活跃文艺期刊改革现场，并且对自身的改版也做出了一些经验积累与准备。

对于《文艺报》这个文艺性的专业刊物而言，回归文学本体，包括对于文体多样性的探索、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是这种专业性办刊的体现。1957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应当发展杂文》的报道，对于杂文与讽刺手法在处理 and 反映内部矛盾时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期，还发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为何遭遇轻视》对章回小说在当代文学环境中的衰落做出了回应，认为“至于章回小说本身，我觉得，不但我个人觉着不宜予以轻视，而且社会上对章回小说，还很不讨厌”<sup>⑤</sup>。1957年5月5日，出版的第5期开始设立“短篇小说笔谈”专栏，来提倡短篇小说的创作。发表了包括茅盾的《杂谈短篇小说》、端木蕻良的《“短”和“深”》、俞林的《关于短篇小说的特点》、林斤澜的《闲话小说》等在内的多篇文章，提出“文艺报提倡短篇小说，我十分拥护”，“短篇小说之所以盛行于较后的年代，其原因还在于文学体裁自身的发展”，而非“短篇小说这一题材的确立和资本主义发达有关系”<sup>⑥</sup>。这些对于文体多样性的探讨，是《文艺报》在具体措施上复原文学自主性所作出的努力。对于不同文体的重新关注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体发展不平衡的僵局，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文学生态。

注释：

- ① 对此可参照王秀涛《“百花时代”文学期刊改革的历史考察》，《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4期。
- ② 《致读者》，《文艺报》1958年第1期。
-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 ④ 《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

- ⑤ 黎之：《1957年纪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 ⑥ 舒芜：《关于“人民日报”改版的题外文章》，《文艺报》1956年第14期。
- ⑦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 ⑧ 古远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 ⑨ 郭小川：《郭小川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 ⑩⑪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张光年谈周扬》，《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 ⑫ 《文艺报》1956年24期，封底广告。
- ⑬ 《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 ⑭⑮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1卷外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1、290～291、298页。
- ⑯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版，第317页。
- ⑰ 《文艺报》1957年第4期。
- ⑱ 这场开始于《文艺报》的讨论，通过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不断引起真正的学术争鸣。敏泽、黄药眠等在《文艺报》上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开始批判。随着批判的深入，《文艺报》《人民日报》《新观察》《新建设》等连续发表观点迥异的循环批判的文章。随后，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在这次讨论中，逐渐形成四派观点，即人们常说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
- ⑲ 朱光潜《从切身的体验谈百家争鸣》：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以前，“我自己要封闭唯心主义，倒是出于至诚，究竟肃清了违心主义没有呢？旁观的人对这个问题会比我自己能作出较清醒的回答。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旧的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能懂得的道理说服我。但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就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老实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心理上向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文艺报》1957年第1期。
- ⑳ 朱光潜：《作者自传》，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 ㉑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艺报》1956年第12期。
- ㉒ 徐调孚：《“小说月报”话旧》，《文艺报》1956年第15期。
- 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川岛对于“同人刊物”的理解。在川岛看来，“语丝”并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因为这“十六个长期撰稿者，原也没有一个什么‘党’或‘派’，只是这十六个人之中有几位——当然鲁迅先生是其中之一，常常在‘晨报副镌’投稿，感到在孙伏园辞职之后，‘晨报副镌’将是另一幅面目，而我们这几个人总还是要动动笔写写文章的，就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同人刊物”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个体及时期具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现在我们认为的“同人刊物”与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的理解大致相同，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同人刊物”似乎也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 ㉔ 张恨水：《章回小说为何遭遇轻视》，《文艺报》1957年第4期。
- ㉕ 茅盾：《杂谈短篇小说》，《文艺报》1957年第5期。

[钟媛 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 邮编 210043]